

国企利益集团化妨碍共同富裕

陈和午

国资委研究员官局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民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目前最重要的途径有三条。第一就是国有资本收益。目前国资预算制度刚刚建立,将来我们要继续推动国资预算制度的完善,在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分红比例,进而使全国人民都能更直接地分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福利。其二是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截至9月8日,国资委按照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已对43家无疑义、产权清晰的国有股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了实施追溯划转的通知,共划转国有股28.66亿股,按照9月8日当天的收盘价计算的市值为280亿元。其三,国有企业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总资产达到42.55万亿元,净资产17.07万亿元,平均每个中国公民都拥有1.29万元。而且这些都是优良资产,多数都在上市公司,很容易变现。

公民如何分享国有企业的利益?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上面所说的公民分享红利的三个途径都很令人怀疑!从理论上讲,国企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也就是说人人都是老板,但现实情况是,国企现在已经变身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这种利益集团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要分红,就要进行利益的再分配。目前除了少量分红上缴国家之外,绝大多数红利还是在国企利益集团内部控制,而要向公众分红显然是一种遥远的奢望。不管是“购房门”故事,还是“天价吊椅”事件,无不表明国企利益的内部化规则。

首先,国有资本收益如何让全国人民直接分享呢?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就从来没有向老百姓和国家分过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的正式公布,期间历经多次利益之争,但还只是上缴国家,且仅仅是10%的比例,90%的利润仍是“躲猫猫”的。而国企的油水要落入老百姓

的口袋,则是相当于要割走国企利益集团的肉,强势的政府拿点钱走尚且如此之难,何况弱小的老百姓呢。

其次,关于社保基金。虽说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对公众来说确实是好消息,因为长期“很值钱”的社保基金终于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但社保基金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参与的,国企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民企也是社保基金的重要贡献者。况且,社保基金中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国企分红的作用也就当然不能太高估了。其实,相对于庞大的国资来说,社保基金从国企获得的利益简直就是冰山一角。

第三,国企如何从根本上促进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这是国企应该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它已经做到的事。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目标仍很遥远。在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背后,掌握了资源,享受了政策的国企却是高亢前行,而民营企业却被不断挤压,“国进民退”现象有增无减。现在都说中国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而这并非居民的

储蓄率太高,而是企业的储蓄率太高,而企业储蓄率太高,又是因为国企利润的连年高涨却不分红造成的。从现实情况看,国企(尤其是大型垄断国企)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依靠特殊政策和资源,不断扩大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反而加大了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异!

民众本应是国企分红的最大受惠者。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曾经说过,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是人民的,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过,在现实中公民分享改革发展红利至今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突破。而在相当程度上,国企已演变成一类特殊利益团体,且这种利益集团化倾向正在不断加强,如果放任这种局面持续,“国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不公平现象就可能日益严重。

(作者为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

焦点评论

经济时评

养老体制改革 须坚持公平原则

陆志明

养老制度改革是中国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但也是难点和热点之一。最近,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牵动了社会各个阶层敏感的神经,据国内相关财经媒体披露:到10月28日,距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5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已经过去整整9个月,然而广东、上海、浙江、山西、重庆等5个试点区域普遍出现推进迟缓的现象。

不仅如此,上述五大试点省份还出现了大规模的事业单位“提前退休”浪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等事业单位将与企业退休的养老金“趋于一致”,潜台词即为高校等事业单位的养老退休金将会出现大幅下滑。按照暨南大学周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时所述:现在每月能收入6000多元,而按照新改革方案算下来,办理退休手续后每月大概收入三四千元,会减少近一半。

之间养老金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的出现事业单位养老金下降趋势,而具体下降规模多大,尚取决于决策层对试点结果的判断与地方财政可能支持的力度。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理应接受社会各界的舆论监督。和医疗体制改革一样,它也应该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讨论基础之上。然而从目前来看,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不但没有进行广泛讨论,甚至据相关媒体披露,一些试点区域为了保证试点稳定,避免公开媒体参与讨论。

此次改革的另一大问题是实行内部分割,即在事业单位内部划分不同类型,不同类型按不同标准执行,这显然违背了有关“公平、公正”的原则。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小学事业单位,继续按照行政单位养老标准执行,而大学、研究机构等事业单位则按照企业单位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国家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单位在养老保障制度改革领域应该确定一种更为合理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消除机构差异,强化自身自愿缴纳养老保险金是根本的趋势。然而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更应重视程序与步骤的公平公正。作为与事业单位类似的行政单位,更应体现本部门改革的表率性,改革更应走在其他单位的前列。如果行政机构的薪酬和养老标准与企业相比另搞一套,并不断上涨,那么势必引发更多的争议。

(作者为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

改善考核才能遏制地方 GDP 注水

叶祝颐

根据已公布数据,各省市前三季度 GDP 增速普遍高于 7.7% 的全国增速,前三季度全国各地 GDP 总和高出全国 GDP 近 2.5 万亿元。国家统计局称,数据差距是因我国目前实行 GDP 分级核算体系存在统计方法和制度缺陷,各地普遍存在重复计算以及“算足数据”等问题。

应该承认,目前实行的 GDP 分级核算体系确实存在统计方法和制度缺陷,但是地方 GDP 注水如此严重,肯定不正常。针对 GDP 严重注水的问题,修正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尤为必要。

地方 GDP 注水的问题一直广为社会所诟病,取消地方 GDP 统计的呼声不断。早在 2005 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就提建议,除全国和省级之外,省级以下各地区不要再统计 GDP 及增长率,也不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而是以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作为主要政绩指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200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的建议更大胆。吴晓灵认为,地方 GDP 成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为造假制造了动力,她建议把 GDP 指标从地方指标中取消,地方只管卫生、教育、就业、环保这些硬性指标。

众所周知,中央正在推行节能减排政策,但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处高资源消耗的粗放水平。为了制造高增长率的 GDP,有的地方不惜大量消耗资源、恶化生态环境。由于“GDP 出政绩”、“政绩出官”的错误思想一直主宰着某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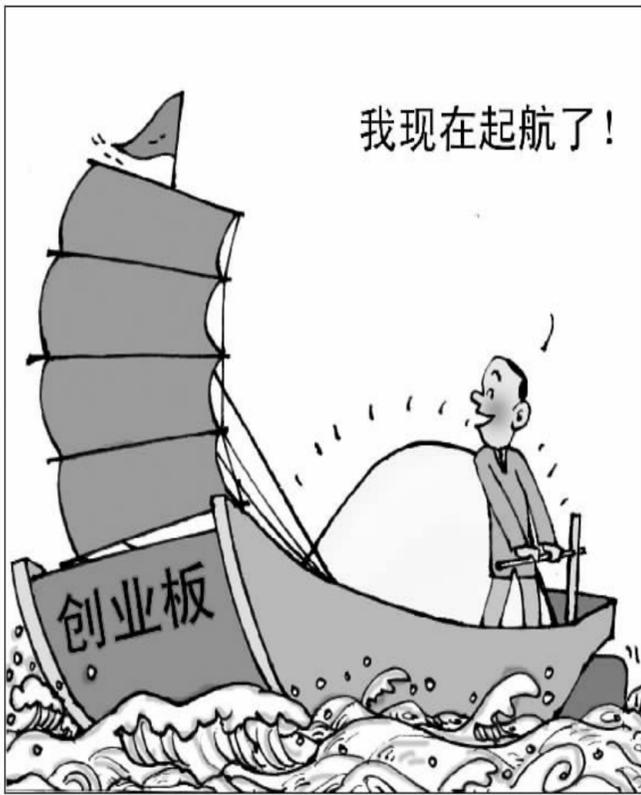
官员的头脑。他们缺乏长远观念、全局意识,为了迎合上级考核的需要,为了追求升迁的资本,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惜大搞提高 GDP 增长率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拆大建,炫耀政绩,并且想方设法把这种政绩工程重复折算成数字符号。哪怕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被某些官员作为政绩展示,乱报 GDP 贡献。某些地方形成了 GDP 年年疯长的“大好局面”。

还有的地方政府在统计 GDP 时奉行双重标准:“要政绩时是一个数字,要补及时又是一个数字”。表面的 GDP 繁荣局面,不但没有实际意义,还可能误导中央宏观决策,挤占民生空间。而不少地方还躺在虚假的 GDP 政绩上沾沾自喜。更可怕的是,这种 GDP 疯长的毛病似乎成了官场通病,统计数字严重注水、GDP 层层加码,相邻地区互相攀比的事屡见不鲜。

毋庸置疑,地方 GDP 的核算体系的确需要改革。但是,地方政府不统计 GDP 问题也很多。因此,要解决地方 GDP 注水的问题,关键是要痛下决心改革政绩评价体系,保持对官员政绩考核的连续性。让地方政府不单纯对 GDP 负责,而应对环境和公共服务负责,修正官员的短视政绩观,从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要改变单纯“向上负责”的行政工作模式,引入多维绩效评价机制。此外,官员绩效评估主体也应该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增加普通民众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的话语权。

财经漫画

不堪重负



徐建军/图

刺泡要趁早 升息莫迟疑

陈东海

10月28日,挪威央行将基准利率提升25个基点至1.50%。这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四个紧缩货币政策的国家。8月24日,以色列央行把基准利率调升0.25%至0.75%,成为全球大危机以来第一个加息的央行。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至3.25%,成为G20集团中第一个升息的国家。10月26日,印度央行宣布,自11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法定流动性比率从24%上调至25%,以收紧信贷增长并抑制通胀预期,并结束部分支持金融业的特别措施,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国家。至此,全球收紧货币政策的鼓点逐渐密集了起来。

但是,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却难以立即启动加息周期。因为这些主要经济体目前的利率政策是紧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或者是经济增长率、劳工就业等数据的。而目前这些主要的经济体,有的

是CPI的同比还没有转负为正,或者是没有达到央行的设定目标,如2%;有的是GDP尚没有转正,经济还没有走出衰退,或者是GDP的增长尚不稳固;有些失业率还居高不下,甚至在攀高。根据传统利率规则操作的央行,在上述几个指标确定性的好转之前是不会加息的。

然而,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仍然沿用过去的标准办法进行货币政策决策,不太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情况,理由有二:

其一,过去的利率设定目标遗漏了金融泡沫的内容。过去的利率调控依据,主要是各国CPI的情况。欧元区设定2%的CPI控制线,在CPI超过这一数值时,一般选择加息。美国主要是根据PCE(个人消费支出)来确定利率政策,设定的PCE区间是1%-2%。但是,目前由于金融产品、投资产品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对于经济的影响非常重

大,因此只是根据CPI等来调控利率,已经脱离了现实。现在,利率对于CPI的作用反而没有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直接和明显,因此,新的利率调控依据,不光要考虑CPI的情况,更要考虑金融指数。目前,尽管许多经济体的CPI等指标尚没有达到升息的阈值,但某些金融市场已经泡沫很大了。如果再不收紧货币政策和升息,新一轮金融泡沫破裂的风险可能就在眼前了。格林斯潘的长期低利率政策,是酿成本轮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各经济体目前的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猛药,比格林斯潘时代要猛烈多了,再不改弦更张,未来的危机可能比这轮危机更大。因此,现在许多经济体,尤其是那些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房地产市场已经牛气冲天的经济体,立即升息是必要的。

其二,低利率政策对就业市场的刺激不明显。所以利率政策紧盯失业率是不合适的。目前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失

业率居高不下,但是这是由于经济失衡等原因导致的,并非是由于利率过高导致的。美国的利率从2008年年初就降至3%以下了,欧元区的利率从2009年年初就降至2%以下,英国的利率从2008年年底也降至3%以下,但是在此之后这些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然是节节升高。目前,各经济体如果想要解决失业率居高企的状况,只有促使本国经济平衡发展,解决自身消费与生产的失衡问题才能根本上达到目的。所以,目前形势下,用紧盯失业率的办法来调控利率也是不适宜的。

因此,在部分国家已经升息的情况下,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应该紧跟升息。这样才能刺破已经浮现的金融泡沫,才能促使经济平衡发展和转型。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

国际纵横

保障性住房建设 蜗牛化需根治

张敬伟

据媒体报道,在今年中央预算安排的重大公共投资项目中,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8月底仅完成投资的394.9亿元,完成率为23.6%。

在金融危机笼罩下的扩大投资年,保障性住房建设却出现“蜗牛”速度。据统计,今年国家共需投入1676亿元,其中,中央投入493亿元,占29.4%;地方配套1183亿元,占70.6%。但结果尴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由于配套资金不到位和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准备不足,可能难以完成今年的建设计划。显然,地方缺乏投入热情,而背后的主因是权力对保障性住房没有兴趣,将之视作了鸡肋。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民心工程,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可是,几年搞下来,“民心工程”往往变成了“民愤工程”。一方面,兴建保障性住房不仅无法像商品房那样有高额卖地款可得,反而要倒贴进不菲的配套资金。另一方面,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公,本来是公平调节的保障性住房成为滋生新的不公平的催化剂。经适房如此,廉租房也问题一堆,要么租金不廉;要么是房源不好,设施不齐,地理位置不佳,令人不满。

顾名思义,经适房的内涵就是经济适用,如果既经济又不适合居住,还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公。这样的经适房建设就失去了其良好的初衷,最后成为社会舆论、社会公众联合声讨的靶子,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不甘寂寞,深度介入其中,引发经适房存续更大的困扰,譬如经济学家茅于軾

就发出廉租房不建厕所以防止富人“惦记”的声音。

众说纷纭中,其实众人都在“器”的层面循环打转,没有触及“道”的根本。经适房出现的所有问题,其实都出在管理上,就决策理念而言,中央保障民生安居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但到执行层面就变了味,不是掺杂了私心杂念,就是缺乏对无房户的从灵魂深处的尊重和关心,变成一种嗟来之食的点缀。不仅权力如此,经济学家不设厕所的观点也同样充满精英漠视草根群体的孤傲。从管理方式上而言,保障房建设从征地、建设、上访到适合人群的遴选、公示,都没有曝晒在阳光下,因此出现全流程的发霉、腐败也就不可避免,最终带来民怨鼎沸。从社会后果看,既然保障性住房无利可图,又不好监管,加上舆论挞伐和民意征讨,最后管理者索性采取鸵鸟政策,延缓进度,甚至终止建设。当权力把保障性住房当做麻烦、负担和鸡肋的时候,激情退却,变成蜗牛化的蹒跚而行。

在房价畸高,众多民众望房兴叹的现实下,保障性住房建设不能缓行,而应加快进度。当然,保障性住房必须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关键是做到信息公开、分配公平。还有就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固然和商品房有所区别,但也要确保民生安居,而不能简而化之、恶而劣之,把政策性保障变成了权力性施舍,使住进此类房型的弱势群体有被歧视和边缘化的挫折感。权力、开发商、经济学家、大众舆论对此均应有深刻的反思,对无房的弱势群体应有起码的人格尊重。